

第一章 緒論

通俗文學藉由網路資源之傳播，重新受到當代人之重視，其中尤以武俠小說藉遊戲軟體之助，重新引起大家的重視，循此風潮武俠小說研究勢必更加蓬勃，本文以《女帝奇英傳》為研究之文本，本章將分二節，依序說明本論文之研究動機及研究方法與步驟。

第一節 研究動機

俠義小說自古以來即鮮受重視，尤其在文人雅士心目中，更是不值一哂。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，俠義小說總是游走在邊緣地帶，較少受到重視，因此，俠義小說可說是中國文學作品中的少數民族了。

一九五〇年代初期，梁羽生（以下簡稱梁氏）的武俠小說在香港文壇上嶄露頭角，金庸繼之而起，以梁氏和金庸兩大武俠小說家為主的「新派武俠小說」就此誕生。梁氏被稱為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山祖師，金庸則被譽為新派武俠小說最傑出的創作者，兩人在武俠文學的版圖上，各自戮力，幾乎成了海外華人社會家喻戶曉的人物，作品更獲得眾人的青睞，使得新派武俠小說得以蓬勃發展，隨之響應的武俠小說家更是如雨後春筍般，帶動了新派武俠小說的熱潮與榮景。

一九六〇年代，台灣當時因為政治因素的考量¹，並未同步引進梁氏和金庸的武俠作品，即使有也是屬於違禁的書籍，只能以各種非正式出版的形貌問世²。儘管台灣當時的武俠小說家雖缺乏創作上模仿的對象，卻沒有降低他們創作的意願，反而激發了他們另闢蹊徑，進

¹ 見 梁羽生傳奇 扎根嶺南，其中提到：「1949年，中國的命運發生了巨大的轉變。梁氏就在那一年到達香港，進入《大公報》工作。這是一家左派的報紙。自此以後，梁羽生的立場，一直傾向於新生的人民共和國。」由於政治立場的不同，因此其作品遭到當時台灣國民政府的查禁。原文收錄於「坐擁書城」網站（<http://www.bookbar.net>）。

² 台灣坊間的梁羽生作品，為了怕被查禁，泰半將作者改為台灣武俠小說家的名字，如司馬翎《絕世奇英》（台北：南琪出版社，一九八三年。）及墨容生《劍怒江湖》（台北：瑞德出版社，一九八一年。）兩部小說，除作者名與小說名稱不同外，內容皆與《女帝奇英傳》一模一樣。

而開創了武俠小說的「台灣奇蹟」，使得古龍一躍而起，與梁氏和金庸等三人鼎足而立，這種結果實令人始料未及。

一九七〇年代末期，由於政治環境的改變，報章媒體與電視電影的推波助瀾，台灣讀者們對金庸及其作品幾乎耳熟能詳，各種研究金庸作品的書籍也不斷問世，甚而有人成立「金學」來深究³；另一方面，身為新派武俠小說開山祖師的梁氏，卻較不為人所重視，雖有人試圖推展「梁學」⁴，卻成效不彰，無疾而終。民生報總編輯陳曉林先生曾說：

在「新派武俠」的創作表現上，梁氏與金庸一直有如雙峰並峙，二水分流；其情景恰與早年傳統武俠小說甫成型時，平江不肖生與還珠樓主兩大名家交相輝映的盛況一樣⁵。

據此，則梁氏與金庸本應受到同等之待遇，而事實卻非如此，這種結果頗令人玩味，也引起了個人的好奇，陳先生又說：

金庸一寫就是二十年，作品共有十四部。但梁羽生在金庸停筆不寫武俠、轉而專心辦報之際，卻獨撐現代中國新派武俠的局面，三十年來寫作不輟，至今猶有新作推出，作品數量已達金庸的三倍，技巧也不斷創新和變化；可見對武俠文學的一往情深，鏗而不捨，梁羽生已達「樂在其中」的境界⁶。

據此，則梁氏之創作力遠較金庸為富，研究新派武俠小說的人往往將梁氏和金庸互相比較，為此，梁氏本人用「佟碩之」的筆名寫了一篇《金庸梁羽生合論》，詳盡分析兩人異同，所

³ 見林保淳《武俠小說的再出發》，其中提到：「自一九八〇年遠景出版《金庸作品集》以來，出版商事實上已開始思考新的行銷方式，沈登恩的策略，儘管純粹出之於商品的考量，挾著金庸在當時的新聞性，借媒體的力量大力傳銷，以致造成了輝煌一時的「金庸旋風」。金學研究自此開展。原文收錄於「中華武俠文學網」網站（<http://www.knight.tku.edu.tw/home.htm>）。

⁴ 台灣風雲時代出版社於1988年7月獲得梁羽生授權出版其武俠作品，書名為「梁學研究系列」，試圖仿效遠景出版社推展「金學」的模式，可惜後繼無力，無疾而終。

⁵ 見柳蘇等著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。），頁九五。

⁶ 同註5，頁九五。

論中有兩句頗為中肯：

梁羽生是名士氣味甚濃（中國式）的，而金庸則是現代的洋才子。梁羽生受中國傳統文化（包括詩詞、小說、歷史等）的影響較深，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藝（包括電影）的影響則較重⁷。

據梁氏之說法看來，其本人對於自己與金庸之間的風格差異，其實是下過功夫比較，也心知肚明的，但是，同樣是宗師級的兩位武俠小說家，所受到的重視程度卻有如天壤之別，唯本論文並非針對兩人之間的比較，而是凸顯作者在文本中對女性的重視。

從一九五四年到一九八四年，梁氏在武俠文壇上辛勤筆耕了三十個春秋，共創作了三十六部武俠小說，總字數達一千餘萬言。一九八四年，梁氏宣布「封刀」，從而結束了「江湖生涯」，金盆洗手，改弦更張，準備撰寫正統歷史小說。在梁氏三十六部武俠小說中，自認《萍蹤俠影錄》、《女帝奇英傳》及《雲海玉弓緣》三書是其生平代表作⁸。在梁氏自認為是生平代表作的三部武俠小說中，個人對《女帝奇英傳》最感興趣，因為在這是一部以女性為主角的武俠小說，在武俠小說的作品中較為少見，明顯與其他武俠小說有所不同。

武俠小說中有江湖，江湖中必有江湖兒女，但男性的角色始終佔了大多數，男性的地位也大都高於女性，在唐傳奇的《李娃傳》中，雖然在故事情節發展上，長安名妓李娃佔有極其重要的份量，最後並受封研國夫人，但充其量也只是一篇以女性為主要角色的作品，稱不上具有女性自主意識。在舊派武俠小說家中，對女性角色刻劃最為細膩者，當推「悲劇俠情派」的王度廬，在其所著的《臥虎藏龍》作品中，描述羅小虎與玉嬌龍之間的情愛糾葛，玉嬌龍為了反抗指腹為婚的傳統窠臼，進而尋找自己的真愛，最後卻是以殉情收場，在此凸顯得並非女性的自主意識，而純粹是出於玉嬌龍的叛逆性格使然。因此，不論在數量或質量上，女性在小說中的地位與份量一直劣於男性，這也是自古以來，男性小說家們刻意貶低與忽視

⁷ 見佟碩之（梁羽生）金庸梁羽生合論，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（台北：風雲時代出版公司，一九八八年），頁一一四。

⁸ 尤今，寓詩詞歌賦於刀光劍影之中——訪武俠小說家梁羽生中提到，梁氏曾說：「『萍蹤俠影錄』、『女帝奇英傳』、『雲海玉弓緣』，可以說是我最喜愛的三部。」收錄於《梁羽生的武俠文學》，頁73。

女性的明證，對女性的偏見自古至今，似乎沒多大的改變，即使武俠小說家對女性抱著欣賞的態度，但那種難以抹滅的大男人主義依舊存在，認為女性總是有依附男性的天性。

在舊派武俠小說家中，對女性角色刻劃最為細膩的當推「北派五大家」的王度廬。王度廬在其成名作《寶劍金釵》中，將李慕白、俞秀蓮及謝翠織三人之間的三角情網，描摹的絲絲入扣。俞秀蓮因早已許配他人，雖然心儀李慕白，但李慕白卻受封建道德觀作祟的影響，始終將俞當作妹妹，兩人終其一生痛苦不已，難以自拔；謝翠織與李慕白邂逅，李慕白不覺將情思轉移到謝的身上，卻因李慕白怕仇人來尋而累及謝，兩人之間也沒有結果。俞秀蓮一生因而鬱鬱寡歡，謝翠織更是悔恨而自裁身亡，兩個女子一生的命運皆因李慕白而有所轉變，女性依附男性的天性不言而喻。不僅如此，就連金庸也有意無意地表現出大男人主義，香港專欄作家吳藹儀評說：

金庸不會寫女人，因為他對女性了解不夠，單從男性的主觀出發，太過注重塑造大男人主義之下的理想女性，以致人物發展缺乏深度，有時缺乏說服力⁹。

金庸筆下的女俠，總是先一番江湖闖蕩之後，即嫁作人婦，因為婚姻的束縛而使生活變的單調貧乏，最後不得不依附於男性的身邊，神雕系列中的黃蓉即是一例。由此可見，因為傳統社會與文化的根深蒂固，影響了許多武俠小說家的創作，間接地使得女性在武俠小說中，長久以來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。

個人發現梁氏對女性的尊重，並非紙上談兵，做做表面功夫罷了，他是真正將男女地位平等的理想實現的人。在《女帝奇英傳》這部武俠小說中，是以唐朝武則天時代為歷史背景，書中充滿了濃厚的女性自主意味，這也是個人以其為研究文本的重要因素。梁氏曾說：

文學形式本身並無高下之分，所謂高級與低級，只取決於作者本人的見識、才力和藝術手腕¹⁰。

⁹ 見吳藹儀《金庸小說的女子》（台北：遠流出版社，一九八九年。），頁五二。

¹⁰ 見羅立群《梁羽生小說藝術世界》（台北：知書房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。），頁四。

他的觀點當時得到與會者的贊同。他認為中國的武俠小說源遠流長，新派武俠小說更表現出進步的思想內容、新的歷史見解和成熟的藝術技巧；無視武俠小說的存在，硬將它排斥在文學殿堂之外，這是很不公平的。對於某些詆毀和否定武俠小說的觀點，梁氏激憤地說：

這只能表示那個人容納文化方面的心胸不廣。他其實也不了解什麼叫做武俠小說；或者他看過的許多武俠小說是荒誕離奇的，這才造成誤解。其實武俠小說有好有壞，文藝小說亦是。即使是反映現實的寫實小說亦有好有壞，如果作者功力不夠、觀察力不敏銳的話，他盡管寫的是寫實小說，還是不能反映現實的¹¹。

他指出，作為一種小說，武俠小說無疑是中國文學百花園中一朵奇異的鮮花，理應受到一定程度之重視。正因為梁氏對武俠小說的那一份堅持深深吸引著個人，平等而理性的女性形象，再加上個人對武俠小說的熱愛，這些因素的多重影響之下，於是對梁氏《女帝奇英傳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，進而產生了以此為文本來進行研究的動機，想使他人能重視梁氏的作品，也更能正視男女平等的重要性，同時讓個人對武俠小說研究的熱愛能一直延續下去。

本論文既以梁氏所著《女帝奇英傳》為研究文本，必有其研究的目的，以下將簡要說明之。

首先揭示個人在做此研究之前，因為外在與內在因素的驅使，使得個人對梁氏的作品產生興趣，進而想以他的作品作為研究文本。梁氏對武俠小說的貢獻已屆五十年，共計作品三十六部，一千多萬言，不僅量多而且質精，對舊派武俠小說的傳承與新派武俠小說的開創，他的功勞不容抹滅。

就文本內容看來，以歷史事件作為時代背景，使個人看來猶如在讀歷史故事一般，這與梁氏的家學淵源有極大的關係。因為作者幼時居於其外祖父家，其外祖父熱衷古典詩詞，這對梁氏來說影響很大，在耳濡目染之下，梁氏自幼便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。青

¹¹ 同註 10，頁四。

年時期，在機緣巧合下，屢遇良師益友，對梁氏諄諄教誨與指導，更加厚實了梁氏日後創作武俠小說的實力。在家學淵源與良師益友的雙重影響下，作者的古典文學功底日趨深厚，兼以作者本身也是武俠小說的愛好者，不創作則已，初試啼聲便一鳴驚人！

前人經驗的啟發與作者個人經驗的影響，體現在文本的思想內涵中。既是武俠小說，又以歷史為時代背景，江湖上的武林豪傑與廟堂之間，有的是為了社稷福祉，有的是為了個人私利，明爭暗鬥，使得情節更富變化性；民族文化融合及正義與邪惡的對立，都是作者的作品中不可或缺的議題，從中便可看出作者對少數民族的尊重，以及名士派的俠客風範。

除了個人對武俠小說的熱愛，以及替梁氏抱不平之外，個人對作者尊重女性的態度極為欣賞。作者在創作武俠小說時，並不會一味地以男性為主，而是將男女擺在一個平等的地位上，不僅如此，以男性的身分來揣摩女性的心理，這份功夫便值得喝采了！一般的武俠小說，女性地位總是處於劣勢，甚至只是男性的附屬品，作者並不盲從前人的技法，反而能細膩地刻化出女性的一舉一動、一顰一笑，對女性心理的描述更是獨到。《女帝奇英傳》中，女性角色佔有極重的地位，又以女性專政的武則天時代為背景，在武俠小說中是一個特殊的文本，重視女性地位的武俠小說家本就極少，梁氏不但重視女性，而且企圖令女性打破男女地位上的不平等，使得個人相當激賞。

文本中各個人物的巧妙安排，不論是外在特徵與內在心理的描述，都展現了作者細膩的個人特質，適時地穿插於適當的場景中。以歷史為背景，有利於情節的發展與安排，可妥善利用歷史事件，或是將史實再編織，加諸在情節發展中，每個讀者皆能輕鬆地觀賞，不會有時空錯亂的感覺，看武俠兼讀歷史，一舉兩得。

總觀梁氏在武俠文學上的成就，應該是家喻戶曉才是，卻未能與金庸的名氣相當，在個人看來是百思不解，因此，個人在選取研究文本之初，即想以梁氏的作品為研究之文本。而後，在梁氏作品中，除了尋得眾所知曉的名士俠客外，更發現了梁氏對女性地位的尊重，在當代武俠小說家之中，可說是第一人無疑。個人最終的研究旨趣，一是想為梁氏在武俠小說發展史上的再定位，二是凸顯梁氏對女性地位的尊重。

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

在中國小說發展史上，不論是志怪、傳奇、神魔、俠義或武俠小說，每個作者必會根據所處的時代背景，並配合自身的思想，以構思出一部作品，因此，廣義來說，小說家也可說是思想家。武俠小說於民國初年開始蓬勃發展，武俠小說家們原本各有自己的理想與抱負，但當時的時代背景仍處於動盪不安的局面，在有志難伸的情況下，只好將己身的理想與抱負融入其作品中。

梁氏作品之時代背景大都與歷史相結合，為了將史實貫穿武俠小說，其思想必具備多元的思考層面，思想史學者史華慈曾說道：

由於「人」的思想具有相當的多面性與複雜性，主要的並不是在做「因果解釋」與「價值判斷」，而是要深入了解這種多面性與複雜性，因此我們從事思想史研究時必須注意到思想家的「思想」與其所處時代之間的相互關係；深入了解思想家本身的「繼承性」與「獨創性」；考慮到思想家的「思想」與其個人的政治、社會、經濟各方面的活動之間的相互影響關係；務必把思想家的「思想內容」，與研究者個人的「價值判斷」做清楚的劃分，不可因為個人的「價值判斷」，歪曲了思想家的思想內容¹²。

本論文以研究文本的思想內涵為主體，但在探討思想內涵之前，我們必須了解梁氏寫作武俠小說的動機，因此，首先必須了解梁氏創作《女帝奇英傳》的淵源，也就是上述所說的「了解思想家本身的『繼承性』與『獨創性』」，待對文本的創作淵源有所認識之後，再對文本的思想內涵進行探究；在探究思想內涵之時，個人將秉持客觀的立場，對梁氏於文本中的「思想內容」與個人的「價值判斷」做清楚的劃分，以免曲解了作者的思想內容。

但思想內涵究竟要如何界定呢？思想史學者史華慈又說道：

¹² 見張永堂譯、史華慈著《關於中國思想史的若干初步考察》，收錄於《中國思想與制度論集》（台北：聯經出版事業公司，一九七六年。），頁一。

依我個人來看，思想史的中心課題就是人類對於他們本身所處的「環境¹³」(situation)的「意識反應¹⁴」(conscious responses)¹⁵。

史華慈對「環境」與「意識反應」兩個名詞有其獨到的見解，個人即針對梁氏所處的「環境」而衍生出的「意識反應」，將文本的思想內涵分為五個課題，一是江湖與廟堂的調和，二是民族文化的融合，三是正義與邪惡的對立，四是理智與情愛的平衡，五是新女性形象的建立。

因此，本論文將以史華慈在思想史上的獨到見解為基礎，進而對《女帝奇英傳》的創作淵源與思想內涵作深入的探討，並藉此延伸到人物塑造與藝術表現的論述，期使以此研究方法來確立研究的步驟，對文本能有深入淺出的探究。

¹³ 同註 1，頁三，「環境」這個字可以用來指所有的時間與空間之內，人類環境中的所有持久的特徵。如全人類的生、死、愛等等普遍的共同特徵，或特定的時間與空間之內特殊的社會與文化的環境。

¹⁴ 同註 1，頁五，「意識反應」也許並不是最恰當的名詞，但是為了要表明本文所說的思想史並不僅是思想的運作而已，因此它事實上比用「思想」(thought)、「觀念」(ideas)或「意識型態」(ideology)等名詞要來得恰當。

¹⁵ 同註 1，頁三。